

朱少伟

抗战烽火中的新安旅行团

抗战时期，新安旅行团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号，行程达5万余里，足迹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个著名少儿文艺团体以其勇敢顽强，创造了一个时代传奇，被文学巨匠冰心称赞为“民族解放的小号手”。

到风浪中经受锻炼

1933年秋，江苏淮安新安小学的7名学生组成一个儿童旅行团，被校长汪达之带领下，决心到民族解放斗争的风浪中经受锻炼、增长才智。

孩子们旅行了54天。在上海停留时，他们走访棚户区，目睹了工人的贫困生活；与报童一起上街卖报，看到了租界里巡捕的耀武扬威；赴吴淞凭吊淞沪抗战战场，了解了侵沪日军发动“一二八”事变后，担负卫戍任务的第十九路军在民众支援下，浴血奋战一个多月，连续挫败日军，使其三易主将、数次增兵、死伤逾万，不禁勇气倍增。

通过实践，孩子们对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所提倡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有了更深切的感悟。此次旅行震动了我国教育界，各地报刊纷纷予以报道。

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经研究认为，在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下，如果公开成立抗日宣传团体必定会遭到各种阻挠，而采用“旅行团”的名义，组织少年儿童到各地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于是，决定帮助新安小学组建少儿文艺团体——新安旅行团（简称新旅）。

新安旅行团的组建，也受到不少知名人士的热忱关心。如陶行知在给汪达之的信中说：“你要我估一估儿童旅行团的价值，这是新时代的无价宝，姑且定它万万万金元吧。这样伟大的宝藏，世界上谁也没有，却为新安所得……”他还为新安旅行团在上海购买了电影放映设备。

毅然离开家乡

1935年10月10日，新安旅行团第一批团员共14人，每人一身单衣、一双草鞋、一把雨伞和一只行李袋，他们打着三角蓝色的团旗，带着一套电影放映设备、几



新安旅行团团员在途中书写标语

部黑白无声抗日影片和数十张抗日救亡歌曲唱片，在人们的欢送下从淮安出发。孩子们曾宣誓：“志愿参加本团生活，誓以忠诚谋团体生活发展，为‘生活教育’努力，为民族生存奋斗！”除了担任顾问并带队的汪达之（后成为中共党员），团员多为10余岁的少年，如12岁的曾兆寿、13岁的曹维东、14岁的张早、16岁的程昌林等。从此，这些孩子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克服各种困难，深入工厂、农村、学校、码头，积极宣传抗日救亡，动员群众团结御敌。

1936年夏，新安旅行团来到申城，驻扎于胶州路15号（现为静安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新安旅行团在苏北排练节目（张爱萍摄）

经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安排，孩子们在多位著名学者和艺术家的指导下，接受了比较全面的文艺培训。在上课时，洪深、张庚讲戏剧与导演；艾思奇讲哲学；孙冶方、骆耕漠讲政治经济学和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过程；冼星海、吕驥、孟波、麦新等讲声乐、音乐。冼星海的一些作品如《救国军歌》等，都是通过新安旅行团先行试唱、教唱后，才修改、发表的。新安旅行团在沪期间，除了认真学习之外，还曾去工厂、学校搞抗日救亡歌咏活动，参加纪念“九一八”游行示威，到南京路散发传单，并成为鲁迅先生出殡时的挽歌队；团员曹维东、张早、左林参加了上海妇女儿童慰劳团，赴绥远（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南部地区）前线慰问抗日将士。

继而，新安旅行团一路向西，抵达宁夏、甘肃等地；在兰州，徐志贯等3名团员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团内建立了党支部。

周恩来给予亲切关怀

1938年5月，新安旅行团抵达西安，这里距离延安已不远，孩子们都渴望前往革命圣地。“你们在国民党统治的广大地区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尤其是在西北这么闭塞和落后的地区，普及抗日宣传，留下了巨大的社会影响，这是你们今后继续在国

民党统治区宣传抗日的有利条件。”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党代表林伯渠说，“关于你们去向，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早就考虑过了，他从我们民族的抗日全局出发作出了要你们尽快到武汉去的指示。”

6月底，新安旅行团进入抗战重镇武汉。那时，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背景下，武汉会战正激烈地进行。

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曾接见新安旅行团顾问汪达之和党支部书记、总干事徐志贯。“家乡出了你们这个抗日的儿童团体，我很高兴！”他微笑着对两人说，“你们跑了半个中国，走了两万里路，为抗日救国奔走呼号。现在抗战已经一周，要争取最后胜利，你们还要努力工作，希望你们立即投身保卫大武汉的运动！”

以“保卫大武汉”为口号的武汉会战，主要在武汉外围展开：日军前后投入的兵力达35万人，中国参战的部队达120多个师；它是抗战时期投入兵力最多、战线最长、时间最久、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也是中国军队歼灭日军人数最多的一次战役，使日军“速战速决”的迷梦被彻底粉碎，抗战开始进入相持阶段。新安旅行团曾以文艺为武器，不分昼夜地在各个场合进行演出，开展“唤起民众、共赴国难”的宣传，激励当地军民同仇敌忾，更英勇地抗击侵略者。

活跃于苏北抗日根据地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特务随时有可能对仍在广西开展活动的新安旅行团下手。在周恩来的关心下，新安旅行团安全转移，团员们分批从桂林绕道香港再经上海，进入苏北抗日根据地。

同年5月，新四军代军长陈毅、政委刘少奇在盐城接见首批抵达的新安旅行团代表，高度赞扬他们跑遍大半个中国宣传抗日救亡所取得的成绩。

新安旅行团在苏北抗日根据地陆续编排了不少文艺节目，演出时深受欢迎；他们还编辑多种少儿刊物，由孩子们独立组成的编辑委员会，先后出版《儿童生活》《儿童画报》《华中少年》《每月新歌》等，陈毅曾为最早创办的《儿童生活》杂志题词：“抗战事业应该让儿童参加，新四军愿做儿童们的良友。”

在新四军军部和苏北区党委领导下，新安旅行团努力开展儿童工作，派出工作队分赴盐城、阜宁、淮安、射

阳、建阳（今建湖）、涟东（今涟水东部）、盐东（后并入射阳）、阜东（后并入滨海）等县组织儿童团、少先队，开办儿童干部训练班，训练儿童骨干。至1944年底，盐（城）阜（宁）区各村均建立儿童团，儿童团员积极协助民兵站岗放哨、侦察敌情、传递情报……

解放战争中，新安旅行团又踏上新的征程；1949年5月，随解放军部队南下，跨过长江，解放上海。不久，新安旅行团更名华东新旅歌舞剧团。新中国成立后，新旅歌舞剧团向中央戏剧学院等教育机构输送了部分学生，以培养高素质的艺术人才；1952年，它与其他文艺团体

魏东海

红色血脉相连忆

——我的家族与山东老家的抗战记



1946年，我出生在山东德州陵城区三河河村，1949年随家人来到上海，1962年来到南翔生活至今，已逾六十载。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虽身在南翔，但家乡的抗战记忆始终铭刻于心，尤其是我家族亲历的那段烽火岁月，在那个被冀鲁边区抗日军民称作“小莫斯科”的村庄里，我们魏家与抗战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次年，党组织委派共产党员来到陵县开展抗日工作。我的祖父魏玉坤是当地名医，他经营的中医诊所因往来人员频繁，成为地下活动的理想掩护场所。当地党组织提出将诊所作为革命据点时，祖父深知事关全家性命，但在民族大义面前，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从此，这个不起眼的中医诊所成为了冀鲁边区二地委的地下交通站和联络站。诊所北屋经常召开党的秘密会议，下面还挖掘了地洞用于救治伤员。1939年4月，八路军在大宗家村与日军激战后，十余名伤员就在我祖父的诊所得救



新中国成立之际，新安旅行团在上海

合并为华东人民艺术剧院（今上海歌剧院前身）。不少原为新安旅行团团员的文艺界知名人士，每当回想起在

抗战烽火中走千山、跨万水，以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心情都会特别激动。

朱元说：“我既然被你们抓住了，就没打算有个好结果。让我招供，没门！”最后被日军残忍杀害，年仅25岁。

军民鱼水情在抗战岁月中处处可见。有一年大年初一，军分区司令员龙书金带着警卫员被日军围在村里。匆忙间躲进一户地主家的地窖，却忘了盖窖门。地主的媳妇发现后，急忙踩着小脚把地窖门盖上，还用冬枣树枝扫去脚印。日军闯入院内，未发现异常，拿了点粮食和一头牛就走了。这位普通农村妇女的机智，保护了后来的开国将军。

三河河村的群众基础极好，被誉为“小莫斯科”。为配合夜间活动的八路军，全村自发打死所有看门狗，实现“灭狗消声”；全村发展了64名党员，无一人叛变；80多人遭日寇殴打，无一人告密。村民还组成破路队，4年间破坏公路40多华里，多次配合八路军破坏铁路。1941年春，陵县日伪军的两辆汽车就在村西陷入陷阱，死伤7人。

抗战时期，三河河村家家户户都养护过八路军伤员。我父亲许文轩曾带领担架队上火线抢救伤员，后来还参加了淮海战役和解放济南的战役，荣立一等功。

1989年，老地委书记何郝炬借到北京开会之机，专程回到三河河村看望乡亲们。一进村，乡亲们簇拥而上，亲切地叫着“大哥”。他坚持不住宾馆，就住在我家旧址，与乡亲们彻夜长谈。第二天，何郝炬欣然给我家题写“红色家庭”四个大字后就赶往北京开会了。不久，山东省和德州市决定由陵城区组建编写组驻村，写了以抗日战争为主体的《三河河村志》，同时在我爷爷的中医诊所旧址上建造了《三河河抗战纪念馆》。

值此抗战胜利80周年之际，追忆这些往事，既是对先辈的缅怀，也是对后人的启迪：中华民族在危难时刻展现出的勇气和凝聚力，永远是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作为定居南翔多年的三河河人，我将永远铭记这段历史，并将这份记忆传递给下一代。

治和护理。在祖父的影响和地委书记何郝炬的教导下，我的伯父魏方成率先加入中国共产党，父亲魏方亭（化名许文轩）于1940年6月也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后来叔父同样加入了党组织。父亲兄弟三人利用行医的便利，为党组织传递情报。祖母则带领全家妇女洗衣做饭、护理伤员。地委书记何郝炬（后任四川省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和军分区司令员龙书金（开国少将）在我家住了四年多。

最令人难忘的是1940年冬天的一个夜晚。年仅19岁的地委书记何郝炬正在院内，突然听到墙外枪声大作。祖母急忙拉住他说：“快从小窗口跳出去往北跑！”何郝炬翻窗而出，直奔结冰的苇子湾。日军搜查无果后撤离，全家打着灯笼在苇丛中找到了他时，发现他的棉衣已与冰层冻在一起，人失去了知觉。经过全力抢救，才终于苏醒过来。

1942年农历7月22日，惨剧发生。祖父早上刚想出村，就碰到罗院据点的日军，被抓了回来。日伪军驱赶着村里上百名群众，其中有地下党员、八路军人员和抗属。日军逼他指认，祖父坚决不说。气急败坏的日军将他绑在梯子上毒打，灌石灰水，灌满了再压出来再灌。但祖父始终不开口，最后被日军用砖头活活砸死，年仅50岁。这位普通的乡村医生，用生命守护了抗日的秘密。

村民魏玉元的故事同样感人。他1940年参加抗日活动，后加入八路军县大队。1942年2月，他探亲返部队时在村头与日军遭遇。凭着好武艺，他一连打倒了两个鬼子和一个伪军，终因寡不敌众被捕。日军严刑拷问，要他交代部队情况。魏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 1945-2025

★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 珍爱和平 开创未来★

勿忘国耻 振兴中华 抗战精神 永不磨灭

80